

◆ 郑择魁 主编

吴越文化 与中国现代文学

◆ 杭州大学出版社

本书编写人员

主 编 郑择魁

撰稿人 (按姓氏笔画为序)

刘一新 朱克玲 郑择魁

钱诚一 彭晓丰

陈力君 陈广录 罗 轶

颜建华

前 言

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不断被拓宽,从文化学的角度来审视成为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随着研究的深化,已不满足于一般文化学的层次,于是,研究者又注意到地域文化这一层面。

吴越文化是一个地域文化(Regional Culture)的概念。地域文化在某种意义上相似于文化地理学,但它具有自己的特点。文化地理学以地理为中心开展文化探讨,以疆域的明确的地理划分为依据。而地域文化学还与历史地理学密切相关,其地域(Region)概念通常是古代沿袭或俗成的历史区域,它由于历史的文化发展而逐步形成,虽然疆域变得模糊,但其地域文化的特点却深深地积淀在人们的头脑之中。因此,地域文化既具有共时性的特点,又具有历时性的特点。形成地域文化圈的原因不单是自然环境,而且有社会结构、文化传统、民风民俗、方言土语等诸多因素,它直接影响着文学艺术的发展。作为亚州文化圈的中国文化,它本身又包含着许多亚文化圈,如: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等等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化圈,它使文学艺术都打上各自文化圈的印记——明显的或隐性的。研究地域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阐明中国现代文学的地域特点,对于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

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助于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的多样性、丰富性,也有助于确定作家的个性。

吴,古称句吴,其祖先生活于今苏南、皖南、浙北一带。越,古称于越,最早活动地区在今浙北及太湖一带。根据考古发掘的资料和历史记载,可以推知:句吴和于越实际上是同一原始部族的两个分支。他们在历史渊源、文化传统方面有许多共同性;如稻作文化与彩陶文化等等。在远古时代,他们互为近邻,杂错相居,语言和习俗十分相近。正如《吴越春秋》所说的那样:“吴与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①《越绝书》指出:“吴越两邦,同气共俗”^②,“吴越为邻,同俗拜土”^③。《吕氏春秋·知化篇》更有这样的记载:“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道属,习俗同,言语通。”^④由此可见,古代吴越地带就是一个统一的文化区。后来两个分支各自发展,出现若干差异,并发生争斗,于是形成吴越两个国家。两个国家之间,发生征战,交叉镇服对方,反而加强了同化和交流。三国时,孙权在此建立吴国。唐以后,吴越地区更加繁荣。五代时,钱鏐在两浙和苏南地区建立吴越国,以杭州为京城。吴越作为统一文化区,更加强了自身的特点。

吴越文化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古代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隔绝,曾被称为“南蛮”,具有质朴野性的特点,且对中原正统文化有抗拒心理。据《越绝书》记载:孔子想去见勾践,向他传播“五帝三皇之道”,勾践喟然叹曰:“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异则不可”。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劣,强敌的欺凌,古代吴越人具有尚武好战的精神。《吕氏春秋》记载:“齐庄子请攻越,问于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遗令曰,无攻越。’越,猛虎也。”^⑤秦始皇统一中国,为了征

服吴越这个英勇善战的“蛮夷”，亲自“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⑥。并强迫越民迁出城市，移入大批北人，企图改变这个地区的民族结构。大批吴越土著逃往闽、赣、粤、桂等南方省份，有的远走东南亚和日本，形成了遍布海内外的“百越”。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连续处于兵燹和动乱之中，特别是“永嘉之乱”后，北人纷纷南逃，大批文人士（如王羲之等）随之南下，出现文人云集江南的景象，并逐步形成了富庶的士族阶层。晋灭吴以后，江南士族在政治上受到压制，产生“朝隐”的心态。自恃“腹有诗书气自华”，便向文化方面发展。由此影响到吴越地区的社会风尚发生重大变化，由尚武转向尚文。在尚文之风导引下，人们的价值取向也开始转变，文人士的社会地位提高，文化艺术逐步繁荣。宋代以降，中原汉民大量南迁，使吴越地区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南宋迁都杭州，吴越地区逐渐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成为文人荟萃之地。明代著名文学家归有光曾说过：“吴为人材渊薮，文字之盛，甲于天下。”^⑦据初步统计，明清两代进士最多的省第一为浙江计 6379 名，第二为江苏计 5958 名，第三为江西计 5057 名。明清巍科人物最多的省第一为江苏计 258 人，第二为浙江计 223 人，第三为江西计 116 人。居全国前三名的皆为吴越文化区的省份。到了近现代，江浙一带教育事业迅猛发展，专家学者人才辈出，吴越地区的中心地带（苏南浙北太湖流域），土地面积仅占全国的 0.37%，人口占 3.4%，而高层专门人才却占 20% 以上，每 10 万人口所出的杰出专家学者累计数为全国平均数的 6 倍^⑧。在中国现代文学家中，不仅出现了鲁迅、茅盾这样文学巨擘，而且涌现了大批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家，如郁达夫、叶圣陶、艾青、丰之恺、朱自清、徐志摩、戴望舒、夏衍等。可列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作家上百名，真有三分天下

有其一的阵势。中国现代作家在吴越地区的大量涌现决非偶然，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吴越地区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氛围也有密切的关系。

对于吴越地区文化史的最新研究证明：吴越地区是中国精神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吴越人民就创造了灿烂的原始文化，特别是稻作、渔猎、陶器和玉器的生产都非常发达，印纹彩陶、吴歌越吟，原始的绘画、音乐也很有特色。吴越人民有轻礼重乐、挚爱自然、富于想像的心理素质，给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魏晋以后，书法和绘画成绩卓著。南宋时期，勾栏瓦肆遍布杭城，话本小说异军突起。继北曲之后，南戏独树一帜。近代吴越文人更得风气之先，龚定庵首倡“诗界革命”，王国维开近代美学之先河。五四前后，文学革命在中国大地掀起，最早提出这一口号的是安徽绩溪留美学子胡适，为五四文学革命作出战斗实绩的是越人鲁迅。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提出“平民文学”的主张，与桐乡沈雁冰共同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提倡“文学为人生”，成为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文学团体。当时，另一个有重大影响的文学团体——创造社，也有浙籍作家郁达夫作为发起人和中坚分子。在鲁迅充满越地乡土风情的小说《故乡》、《社戏》等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一个“乡土文学”的流派。“乡土文学”派作家不限于吴越，但吴越作家群却曾是其中的主要成员，如许钦文、王鲁彦、许杰，直至后来的柔石、巴人等。这一流派的影响延续至今。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吴越作家群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毋庸讳言，吴越地区中国现代作家群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决不仅仅是接受吴越文化传统的结果。五四新文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开端，是对传统的超越。鲁迅、茅盾、

叶圣陶、朱自清等文学巨匠，他们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底，又吸取了西方先进文化的养料，他们广纳博取，超越民族和地域文化的局限，确立了以人的解放为宗旨的整体人类文化观念，使他们成为中国思想界的先驱，新文学的旗手。所以，我们不赞成地域文化决定论；同时，我们也反对地域文化取消论。因为，地域文化存在是客观事实，对异域文化的吸取并不会使本土文化消失。吴越文化本来就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从春秋以来，吴越文化就在不断的吸纳、交融中发展。吴王阖闾就先后收留了由楚奔吴的伍子胥和由齐来吴的孙武，予以重用。吴人言偃还到鲁国师从孔子，将先进的齐鲁文化带回江南。越王勾践的重要谋臣范蠡、文种也并非越之土著。秦始皇统一中国，更把中原文化带到吴越。随着航海业的发展，濒临东海的吴越地区占有对外交往的优越条件。清朝末年，国门被打开，西方经济、文化侵入古老的中国。原属吴区的小渔村上海，一跃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头堡，影响首先波及苏、杭一带，使吴越地区的开放性特点更加突出；同时，苏杭民风中的传统积淀仍然稳定地保存着。它们互相交融，构成吴越文化的新景观。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作家，不可能不受影响，因为：“个体所属的文化提供了他生活的原始材料……每一个男女的每种个人兴趣都是由他们所处的文明的丰厚的传统积淀所培养的”；“生物遗传行为的影响范围很小，而传统继承的文化进程的作用巨大”^⑨。所以，在世界文化大交融的今天，我们选择地域文化这一研究视角，仍然是必要的。

吴越文化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演进过程，它经过不断的整合与重构，形成一个庞大的体系，蕴藏着丰富驳杂的内涵，要对它作出准确的概括是十分困难的。本书从阐述吴越文化的特点切入，既着眼于文化发展的历时性特点，又立足于现实存在的共时性特点。但

是,我们只是从文学艺术发展的角度提取某些特征,或者说只是从中国现代文学出发返观吴越文化,并不是对吴越文化特征作全面的论述。关于吴越文化与中国现代作家的关系,我们企图先把握其整体艺术思维特征,从创作心理角度来探讨;然后选择五位有代表性的作家,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论述。风俗和方言是区域文化中最明显最稳定的因素。丹纳曾经说过:“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⑩丹纳的论断虽然不无偏颇,但他至少说明了风俗对于文学的重要性。至于语言,作为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是通过约定俗成长期积累而固定下来的;统一的汉民族语言形成以后,方言仍不会完全消失,而且保持其独特的生动性和地域色彩。周作人说:“我尝猜想一个人的文章往往暗中受他方言的支配,假如他不去模拟而真是诚实的表现自己。”^⑪方言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也是不可忽视的。因此,本书用两个专章论述吴越民俗、方言和新文学的关系。虽然我们在这一研究领域里作了辛勤的耕耘,但是收获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而且由于出自几位作者之手,在观念和表达上都无法强求一致。要从理论上阐明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我们对“吴越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还只是局部的、粗浅的。但是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虽然现代科技的发展,将使地球变小,在未来的地球村里,人们相互隔绝的状态将不复存在,统一的世界文学必然会出现。但文学是富有个性存在的精神产品,失去了个性也就丧失了文学的价值。因此文学创作总得有地方色彩,而且正如鲁迅说过的那样:“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⑫因此,研究和重视区域文化和文学的地方色彩,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

和世界文学的丰富都是有意义的。我们要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文学传统,弘扬民族文化精神。使中国新文学更深地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在世界文学的百花园中放射出更灿烂的光彩。

本课题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课题组成员为:刘一新、朱克玲、郑择魁、钱诚一、彭晓丰(以姓氏笔画为序),硕士研究生陈力君、陈广录、罗轶、颜建华(以姓氏笔画为序)参加了部分章节的撰写。各章执笔人为:前言、第五章第一节郑择魁,第一章朱克玲,第二章彭晓丰,第三章颜建华,第四章刘一新,第五章第二节钱诚一,第五章第三节罗轶,第五章第四节陈力君,第五章第五节陈广录。本书承蒙杭州大学出版社学术专著出版基金和杭州大学董氏文史哲研究奖励基金资助出版。在此表示感谢。

注:

①《吴越春秋·夫差内传》。

②《越绝外传·记范伯》。

③《越绝外传·记策考》。

④《吕氏春秋·知化篇》。

⑤《吕氏春秋·顺民篇》。

⑥《史记·秦始皇本纪》。

⑦《震川文集》。

⑧缪进鸿《长江三角洲与其他地区人才的比较研究》。

⑨[美]Ruth Benedict《PATTERNS OF CULTURE》。

⑩丹纳《艺术哲学》,第3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⑪周作人《〈绍兴儿歌述略〉序》。

⑫鲁迅致陈烟桥,1934年4月19日。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吴越文化的特点	(1)
第一节 勇于开拓,顽强进取	(2)
第二节 吴越重乐,至爱自然	(10)
第三节 秀美壮丽,异彩纷呈	(18)
第二章 吴越文化与现代作家的艺术思维	(35)
第一节 浙东作家“土性”的艺术思维特征	(37)
第二节 浙西作家“水性”的艺术思维特征	(51)
第三章 吴越民俗与中国现代文学	(70)
第一节 吴越民俗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	(72)
第二节 江浙现代文学的民俗形态	(84)
第三节 江浙现代文学的民俗功能	(94)
第四章 吴越方言与中国新文学	(111)
第一节 吴越方言——吴越文化的基本载体与直接现实	(111)
第二节 吴越方言孕育了吴越作家	(116)

第三节	吴越方言丰富了中国新文学·····	(123)
第四节	吴越方言的局限、择取原则和规范化·····	(148)
第五章	吴越文化与中国现代作家·····	(155)
第一节	鲁迅与越文化传统·····	(156)
第二节	茅盾的文化性格与吴越文化精神·····	(170)
第三节	叶圣陶的小说创作与吴越文化·····	(186)
第四节	吴越文化与朱自清·····	(202)
第五节	越文化与周作人·····	(218)

第一章 吴越文化的特点

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起着制约作用,尤其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地理环境决定着某个地域人们的生活方式,乃至形成这个民族的性格,影响着他们的文化发展,因此要研究文化艺术的发展渊源、传统影响,首先要了解这个地域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还要知道在这片土壤上生息的民族,人们长期形成的性格特征。《淮南子·地形训》:“土地各以其类生”,所谓“轻土多利,重土多迟。清水音小,浊水音大。湍水人轻,迟水人重。中土多圣人,皆象其气,皆应其类。……是故坚土人刚,弱土人肥,垆土人大,沙土人细。息土人美,耗土人丑”。山川大地不仅制约着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影响着人们的体格、气质、情感、个性,以至于由此而发生的精神生产——文化艺术,从而表现出各种地域文化的差异。丹纳以为要研究艺术这片茂盛的鲜花,先要分析种子,即分析种族及其基本性格,他说:一些大的民族从他们的出现到现在,逐一考察,他们必有某些本能、某些才具,非革命、衰落、文明所能影响^①。因为这些本能与才具是与血统一同传下来的,在最初的祖先身上显露的精神本质,在最后的子孙身上照样出现。民族的基本特征甚至不受时间影响,它始终存在着,由于历史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有所扩张或有所限制。虽然一个民族在长久的生命要经过好几回更新,但它的本来面目依旧存在,这些民族性格特征犹如深深埋藏的原始地层,它是永远留在民族身上的乡土痕迹。

我们研究江浙现代作家与吴越文化的关系,就可以从吴越地

区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着手研究吴越的水土如何在民族性格上打下了乡土的烙印，探索吴越民族的文化如何体现了这个民族性格的基本特征，看看现代作家的创作风格与吴越文化的特点有什么渊源关系。

本章从以下三方面作些探索。

第一节 勇于开拓，顽强进取

吴越地处宽广的长江河口三角洲，西起皖南，东濒大海，北抵江淮，南达宁绍地区，吴越先民生活的地理环境十分复杂，既有丘陵地带，又涉滨海之区。《汉书·严助传》：“越方外之地……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地深昧而水多险，……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数寸，而其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者。”又《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所载阖闾言：“吾国僻远，顾在东南之地，险阻润湿，又有江海之害”，所谓“其川三江，其浸五湖”，虽水乡泽国，气候湿润，但迫于江海，屡遭水患。尤其是约一万年卷转虫海侵的发生与发展，自然环境恶化，沿海平原成为一片汪洋，人们的生存范围缩小，同时土地盐碱度增高，对农事极为不利，吴越先民在生存搏斗中遇到更多的艰难险阻。虽然自然环境对原始民族的生存影响极大，但是我们的祖先敢于与自然灾害抗争，在困境中韧性战斗，练就出一股勇猛强悍之气，在蕃衍发展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他们勇于开拓，顽强进取，从不懈怠，先民们不仅使自己的生活环境适应自然环境，还企图以自己的力量去征服自然。东南沿海地区，太湖周围的低洼平原，时常洪水泛滥成灾，滔滔海水倒灌，淹没土地房舍，“其民与鱼鳖鼃黿列杂处”，先民积极抗争，“是以剪发文身，烂然成章，以像蛟龙，将避水神也”。以此适应渔猎捕捞生活。《淮南子·原道训》：“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

像鳞虫，短绠不綯，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其中部分先民不甘困死家园，逐渐迁散，有的迁徙会稽、苏南山区，他们“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在崎岖的山林中发展生产与文化。从出土文物看，当时的生产工具中以箭头、矛、小石镑最多，虽以狩猎采集经济为主，但始终没有放弃农事，他们既在旱地种栽杂粮又运用以往积累的农耕生产经验，开辟水稻耕作，《勾践阴谋外传》中提到于越农事：“春种八谷，夏长而养，秋成而聚，冬畜而藏。”于越民族刻苦勤劳，敢于开拓，生息繁衍所到之处“火耕水耨”发展生产。也有的先民习水便舟，飘洋过海，迁移到舟山群岛，有的浪迹台湾、琉球、印度支那及日本南部寻求发展。《越绝书》中分别称他们为“内越”与“外越”。外越先民是世界上最早尝试征服海洋的民族之一，他们不畏艰险，勇于开拓，带着平原积累的生产经验，在哪里生存发展就在哪里传播本民族的经济文化。

吴越先民勇于开拓、顽强进取的精神代代相传。吴越民族在生存发展的过程中，克服重重自然障碍，利用有利的自然条件发展生产，积极改造自然环境，发展经济文化，把东南地区的远古文明推向一个高峰。

由于先民的开拓精神，吴越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已有高度的发展。主要分布在浙江宁绍平原与杭州湾一带的河姆渡文化已在中华大地放射出异样的光彩，它不同于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是以栽培水稻为主的耜耕农业。先民利用南方气候暖和潮湿，雨量充足，作物生长期长，具有水稻生产优良的自然条件，广泛种植水稻，成为重要的经济收入。在河姆渡遗址发现大量人工培育的稻米，豢养的猪狗牛羊，生产工具有制作精细的各种骨器，最具特色的是骨耜，还有石斧、镑，木制的刀、矛、镞、耜、筒等。此外还有陶釜、漆器，玉、石、骨、牙等装饰品。可见稻作文化使落后的渔猎经济很快得以改观。距今七千年左右的河姆渡居民能在村落中“凿井而饮”，居“干栏”，并驾独木舟在江河湖海上活动。据考古学发现，在河姆渡

遗址的第三、四文化层中，共发现了六支木桨，均有柄部与叶部，还发现一只陶舟。古越民族“习于水斗，便于用舟”，为适应纵横交错的江河湖海的自然环境，发展水上交通成为生活交往中的主要动脉。而“干栏”式建筑，是带有榫卯的木构建筑。居“干栏”，一方面说明当时木构建筑技术已相当发达；一方面又说明这种房子既可防湿热，又可防兽害，最适宜于江南水网地区的自然环境。河姆渡文化正是古越先民韧性战斗，利用自然环境开拓大自然的文明结晶。先越的文化为后代的子孙文明留下了许多可继承的遗产。太湖地区又先后出现了马家浜文化与崧泽文化，已发现许多磨光的石器、三角形犁形器、条形凿等生产工具。距今六千多年前住在太湖南岸湖州邱城遗址的先民，已开凿了小型渠道，引进水源从事农耕；距今五千二百年到四千三百年的良渚文化，发现有磨制精细的石镰、石钺、翼形耘田器等生产工具。杭州湾还出土大量的植物种子、木器及编织物。可见吴越先民在利用自然、开发大自然的斗争中，所获得的胜利，不仅有遍及南方的水稻耕作，太湖和杭州湾区发达的水上交通，还有发达的编织、纺织手工业及精致的工艺制造。

吴越民族是一个韧性战斗的民族，无论迁徙到哪里就把开拓精神带到哪里，把民族文化传播到哪里。据考古学家分析，河姆渡文化的居民向北发展，创造了广播大江南北的青莲冈文化。据淮安青莲冈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及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的报告，青莲冈文化出现了东方沿海常见的有段石铤。山东大汶口文化的生产工具中也存在着有段石铤，这都是江南越族迁移到江北而开拓、传播的文化遗迹。古代吴越民族沿西太平洋海岸北上发展，有的溯长江西上，把吴越文化带到湖北、江汉地区，也有的向西南开拓，把良渚文化传播到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直到台湾海峡和日本。据考古学发现，距今四千七百年左右的赣西山背文化、广东石峡文化都受良渚文化影响，在新石器时代的墓葬中发现有炭

化稻米，可见发达的水稻栽培农业已很快传遍华南地区。据日本考古学者认定，显示日本新石器弥生时代的特征物：日本石镰，是由我国太湖地区传到日本的，而日本最早的稻作遗址——北九洲的板府，所出土的炭化稻谷，经测定为距今三千年前的稻谷，日本学者搜集了亚洲 766 个水稻品种，经科学分析比较认为它也是从中国长江口传入的。这些都证明了吴越先民勇于开拓、顽强进取的精神遍地开花，他们的足迹所到之处，吴越稻作文化就生根发芽。

吴越民族在开拓传播文化的同时也不断吸取外来文明，把其他民族的文化观念、生产经验吸收进来，毫不保守地融进到本民族的文化之中。吴越地处东隅，远离中原，被称为“隅夷”、“夷蛮”，但吴越民族并不屈服于中原统治者的势力，文化精神上很少传统观念的束缚，也没有条条框框作为前进的桎梏。凡有利于本民族发展的均被大胆吸取，因而不但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时时被容纳进来，还有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中游的楚文化，都被不断交流融合进来。可以说吴越文化就是在与四周邻近地域文化的交流、融合中不断开拓发展的。《吕氏春秋》记载句吴寿梦二年，有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而奔晋，又自晋使吴，“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阵，教之叛楚。……吴始伐楚，伐巢，伐徐。……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历史上吴楚战争频繁，起初，吴师、越师都以短兵相接见长，兵器亦以戈、矛、剑为主，不善射，而楚人劲弩善射，吴越战之则败，只能宾服而已。以后吸取了中原先进的车御，先进的战术，才步入“吴大兵强”“吴强而富”的时期。吴越民族不保守，善开拓，勇进取，自古便善于引进技术，引进人才，且从不忌讳敌方人才，吴楚虽战争不断，但引进楚国的人才不少，从早期的屈巫到以后的伍员、伯嚭、范蠡、文种等，他们对吴越民族的历史发展都起过一定的作用。再从绍兴 306 号战国墓出土的实物资料看，其中有铜质房屋模型，顶部有鸟图腾柱，有铭文的徐国铜器具有楚文化特征的纹饰。该墓属越墓，而同时随葬了越、楚不同风格的器物。吴越与楚虽干戈相加，

仍玉帛相通，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融合。

吴越古地，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成为会稽郡。《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秦始皇统一越国地区一部分越族之后，还进行移民，“是时，徙大越民置余杭，伊攻□故郛，因徙天下有罪适吏民，置海南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②。在民族大徙移中，有的越民被迁徙至江淮，部分南徙的越人至福建，另一部分至广东、广西、湖南，更远的到贵州、云南一带，而大部分越民仍留在吴越故地，同时吴越地区又从北方迁来了一批汉人。民族大徙移的同时也出现了民族的大融合，大同化。显然民族的融合是历史发展的一种趋势，吴、越先民早就“同气同俗”，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又与邻近的楚人相交融，战争中深入齐鲁“城下”，又北上盟会诸侯于黄池与华夏诸国，民族南北交融，势必人口杂合。历史上各民族的发展本身就体现了民族的大融合，吴越民族当然不例外。从民族的发展史看，有交融有更新，然而民族的某些性格特征却依旧渗透在后代的血统里，表现在他们的精神文化的产品之中。顽强开拓，不因循守旧，敢于进取，韧性战斗的精神依然在吴越地区这块土地上扎根、开花、结果，代代相传，形成吴越地域文化的特征。

如东汉的思想家王充，会稽上虞人，面对当时盛行的谶纬迷信之学，敢于冒杀身之祸，挺身反对迷信思想。他的《论衡》就是为反对虚妄的谶纬迷信而写的，公开声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他继承了吴越的开拓精神，有大无畏的唯物主义思想，认为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人不可认识的，极力反对愚昧迷信，反对统治者的思想禁锢，主张记述或评价事物都应合乎事实，不能“妄记”，不应混淆是非，以讹传讹。如对前人神秘的音乐理论、传说中的迷信思想作了大胆的批判。《韩非子》中记载晋平公要师旷演奏清徵、清角乐曲，居然有玄鸟二八从天而降，随琴声起舞，奏清角时召来祸害，狂风暴雨四起，晋国